

Review on Public Finance & Economics

財政經濟評論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研究所 编
湖北财政与发展研究中心

2014年·上卷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2014 年 · 上卷

No. 1 2014

Review on Public Finance & Economics

財政經濟評論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研究所 编
湖北财政与发展研究中心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财政经济评论. 2014 年·上卷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财税研究所, 湖北财政与发展研究中心编.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7-5141-4657-6

I. ①财… II. ①中…②湖… III. ①经济-文集
IV. ①F-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02404 号

责任编辑: 白留杰
责任校对: 刘欣欣
责任印制: 李 鹏

财政经济评论

2014 年·上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研究所 编
湖北财政与发展研究中心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教材分社电话: 010-88191354 发行部电话: 010-88191537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箱: bailiujie518@126.com

天猫网店: 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 [http://jjkxcbs. tmall. com](http://jjkxcbs.tmall.com)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87×1092 16 开 11.25 印张 200000 字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41-4657-8 定价: 39.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8819150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財政經濟評論

Review on Public Finance & Economics

编委会名单

学术顾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国强	王亘坚	丛树海	许毅	许建国
刘邦驰	陈共	何盛明	何振一	吴俊培
张馨	姜维壮	贾康	高培勇	梁尚敏

编委会主任

杨灿明

编委会副主任

陈志勇 庞凤喜

编委会委员

陈光焱	王金秀	侯石安	叶汉生	刘孝诚
艾华	甘行琼	李大明	刘京焕	

编辑组成员

主任: 庞凤喜 (兼)

编辑:	李波	李景友	高亚军	薛钢
	程黎	王银梅		

目 录

纪念布坎南教授

自由与秩序的苦乐纠缠：从《自由的限度》中译谈起

——纪念詹姆斯·M. 布坎南教授

..... 张群群（1）

作为财政学家的布坎南

——已故诺奖得主被忽视的身份

..... 马 珺（13）

改革前沿

我国城镇化建设资金问题的几点思考

..... 马衍伟（23）

我国环境税费制度及其实践效应分析

..... 彭继旺（34）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效应分析与改革建议

..... 潘明星（54）

理论探讨

美国财政联邦主义的发展演变及启示

..... 王德祥（65）

国债期货对我国国债收益率的影响：基于事件分析法的研究

..... 庄佳强 (86)

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研究

..... 张文剑 甘 甜 李 倩 (101)

我国政府预算理论研究与制度变迁述评

..... 赵常恒 宋菲菲 (120)

调查研究

城市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的财政资源配置

——基于对苏沪鲁粤等地的调研结果

..... 李炜光 陈 慧 (129)

论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治理

——基于大连市的调研资料

..... 贺蕊莉 董 岩 刘媛媛 刘书豪 (138)

社保制度研究

关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问题的思考

..... 周成刚 (149)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养老保险制度重构

..... 徐 晓 (161)

纪念布坎南教授

自由与秩序的苦乐纠缠： 从《自由的限度》中译谈起

——纪念詹姆斯·M. 布坎南教授*

张群群

摘要：本文以译者个人视角，叙述詹姆斯·M. 布坎南的《自由的限度》中译本出版受挫的曲折经历，从一个侧面揭示中文世界理解和接受布坎南理论思想存在隔膜和障碍。结合布坎南学术自传材料，简要回顾其理论发展的基本线索和思想源流，指出此书在其整个学术生涯中具有特殊地位。参照首次公开发表的布坎南为该书中译本撰写的序言，本文主张中文学术界有必要重新认识其思想特征，努力消除过去对其理论适用性的误解，重视其社会秩序思想所具有的普遍适用性；而片面强调其自由理念所衍生的政策主张，甚至错误地为他贴上保守主义者的标签，进而无视和抛弃其基于古典自由主义立场而不排斥建构论的社会思想中的秩序理念和公共推理，则是巨大误解，无异于买椟还珠。

关键词：《自由的限度》；社会秩序；公共推理

2013年1月10日，朋友传来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M. 布坎南教授逝世的噩耗。稍缓几日，我给《自由的限度》中译本的责任编辑发去短信：“几天前布坎南辞世。我内心的一部分也随之死亡。”几天后北京举行了布坎南学术思想研讨会，会议议程后面的来宾名单注明我是《自由的限度》一书

* 本文的主要内容是作者在布坎南思想研讨会（2013年1月19日在北京举行）上的发言。本文发表时又作了修改和增补。

的译者。我的内心五味杂陈。因为，对我来说，这牵涉一桩伤心事，也有无法释怀的愧疚存乎其中。如今作者已然归去，回想起我与布坎南这本书的缘分，常常思绪难平，胸中有万千感慨。《自由的限度》一书中译的曲折历程，折射出中文世界理解和接受布坎南学术思想的隔膜和巨大障碍；布坎南辞世后，中文学术界有必要重新认识其思想源流，并应努力消除过去对其理论适用性的误解。

一、初识：倒转的时光

1998年，几位朋友和我合作翻译了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名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在此期间，我还和友人合作译完美国经济学家奥利弗·威廉姆森的《反托拉斯经济学》。新近调入出版社工作的一位朋友看到我醉心于纯理论著作，且对译事一向严肃认真，于是把刚刚联系好版权的《自由的限度》一书交给我。那时我就非常清楚，这些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学术译介活动，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潮流的余波。这些生于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的年轻学者们，当年是在校园和街头观察我们这个社会的革新与冲突；十年后，他们仍然没有褪尽理想的光芒，转而迈进人类思想最幽深的领域。

虽然刚踏上学术研究之路，但我马上意识到了《自由的限度》这本著作的分量。一名兼做学术翻译的专业学者，在其一生之中很少有机会邂逅这么出色的大师之作。现在回想起来，似乎可以说，布坎南在年轻时的阅读中偶然遇到的是威克塞尔；而我迄今遇到的多数缘悭一面的大师，则是卡尔·波普尔^①、詹姆斯·布坎南^②、奥利弗·威廉姆森^③和马克斯·博伊索特^④。

① 卡尔·波普尔（Karl R. Popper, 1902~1994），20世纪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一位哲学家，其研究领域涉及科学方法论、科学哲学、社会哲学和逻辑学等学科。笔者曾和多位学者一道，共同翻译了波普尔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代表作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陆衡、张群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现代西方思想丛书”。

② 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 1919~2013），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公共选择理论奠基人和宪政经济学之父，198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笔者曾翻译了布坎南的《自由的限度：在无政府和利维坦之间》（2001年），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译本迄今尚未出版。

③ 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 1932~），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以交易成本经济学和经济治理理论著称，200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笔者和黄涛教授共同翻译了威廉姆森的《反托拉斯经济学：兼并、协约和策略行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④ 马克斯·博伊索特（Max Boisot, 1943~2011），英国著名管理学家、战略管理专家，以其有关信息经济、信息空间、知识资产和社会学习的理论著称于世，曾获得2000年度伊戈尔·安索夫战略管理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在北京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工商管理教育项目，并担任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的前身中欧管理中心首任教务长兼主任达五年之久。笔者曾和陈北先生共同翻译了博伊索特的《知识资产——在信息经济中赢得竞争优势》，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世纪前沿”。正文中提到的这四位学者中，笔者仅有幸同马克斯·博伊索特教授见过一面（2009年10月，英国伦敦）。

接受《自由的限度》这本书的翻译任务，是因为对布坎南教授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思想的兴趣。如果一位经济学家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只是因循本学科和其他学科领域里被人重复了千百遍的陈词滥调，那么，他的工作就没有多少意义可言，他的研究就不会为人类知识宝库增添任何财富。而布坎南教授无疑是一位具有批判和创新精神的经济学家。

根据笔者有限的学识和肤浅的理解，在我的眼里，布坎南教授是一位既热爱自由，也酷爱秩序的人，而且他深刻地懂得自由的局限和秩序的艰难。布坎南详细阐明了经济和政治决策理论的契约和立宪基础，改变了经济学家们分析经济和政治决策的思考方法，开辟了研究政治家自身利益和非经济因素影响政府经济政策的道路，其工作成果丰富了我们对于政治、法律和经济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解。他对立宪秩序问题的关注和深入研究，使《自由的限度》这本书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对公共选择理论发展的贡献。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艰辛的翻译工作使我在劳作中获得了思想快乐和精神愉悦。

中译稿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是在农历辛巳蛇年（2001年）正月初五凌晨一点多钟。至此，属于我自己的节日才算真正开始。很久没有体验这样轻松的心情了，当日下午，走出昏暗阴冷的筒子楼，到街上闲逛。前几天下雪，差不多已化尽。附近西四环路施工场地节日里停了几天工，加上降雪的净化，空气从来没有这么清新过。忽然间，觉得阳光有些炫目。入冬以来，头一次感到天光如此之美。一年四季，这样的阳光，从来不会照进我那间居室的墙壁，从来没有照耀过北窗台上那几盆绿色植物——它们只长叶子，永远不会绽放花朵。

翻译这本书，让我在一定程度上暂时摆脱了现实生活中的无力感。虽然没有能力让阳光照到简陋居室的墙壁，无法让北窗台上的植物开出花来，但我至少有语词、句段和标点。我让她们在自己指尖的跃动中，翩飞起舞。在我目光的温情注视下，她们时而旋转腾跃，轻盈舒展，飘飘欲仙，时而贴近地面，柔韧厚重，饱蕴激情。于是，我及时调整目光的色彩和亮度，或者作为她们舞台的背景灯光，或者为情节的铺展渲染情绪。

“有些种子要做肥料，有些种子要做泥土，有一些种子是天生就要开美丽的花。”一部外文佳作就是异域里的美丽花朵。当其思想融入另一种语言天地，用来培植本土成果时，它就化作了肥料。这片土地上的种子再长出茁壮的枝叶，迎接光彩夺目的盛开时节。而学者们用于翻译引介的努力，大概就像种子做了泥土。唯愿这泥土做得称职，而且，只要你开得足够绚烂，足够美丽，我懂得欣赏。

二、漫溯：思想的源流

公共选择理论以及后来的宪政经济学学派滥觞于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在这一理论流派的后续发展过程中，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广义的公共选择又分为不同的支脉和分支领域。支流万千，总有其源。除了现实背景之外，布坎南学术思想发展的逻辑线索究竟是什么呢？《自由的限度》一书在其中又处于什么位置呢？以下简要谈逻辑线索，间或提及社会现实背景。

布坎南学术思想研究专家、我的同事马珺研究员，在着手翻译布坎南的《公共物品的需求与供给》一书时，通读了布坎南的绝大部分著作。在此基础上，她认为，从布坎南整个思想历程的发展脉络来看，如果忽视布坎南作为财政学家的背景，可能导致对其思想的理解失去一个最主要的支点。^① 对这一观点，笔者深以为然。

首先，财政学研究是布坎南学术生涯的重要起点。布坎南先是在芝加哥接受了弗兰克·奈特的交易范式和市场秩序思想，接着受到了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威克塞尔的博士论文《财政学研究》和意大利财政学家安东尼奥·德维蒂·德玛尔科财政学思想的深刻启发和共同影响，完成了《财政学的纯理论》，主张把国家理论与税收规范紧密联系起来，就此他以主流财政学理论批判者的姿态，进入美国经济学界。

其次，公共选择与社会秩序问题从一开始就构成了布坎南学术研究的基本要素。20世纪50年代中期，布坎南发表了评论肯尼斯·阿罗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1951）以及比较投票中和市场中的个人选择的两篇文章。^② 多年后，布坎南在其思想自传《胜过耕田》中提到，他后来对公共选择所做出的贡献中，发展了这两篇文章所包含的核心要素。

阿玛蒂亚·森以这两篇文章及其与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之间的联系为例，总结了布坎南思想方法的特征。森（2011）指出，布坎南认为民主制作为经过讨论协商达成治理的体制（Government by Discussion），必然能够实现决策过程改变个人价值，从而极大地充实了社会选择和公共选择必然涉及的对众多不同个人价值进行加总这一核心主题；阿罗认定决策过程本身无法改变个人价值，只有经过布坎南对这种认识所进行的拓展，我们才能够正确处理启蒙运动

① 参见马珺：《作为财政学家的布坎南——已故诺奖得主被忽略的身份》，在布坎南思想研讨会（2013年1月19日·北京）上的发言。

② 这两篇文章是：James M. Buchanan, Social Choice, Democracy, and Free Marke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62, No. 2 (Apr., 1954), pp. 114-123. James M. Buchanan, Individual Choice in Voting and the Marke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62, No. 4 (Aug., 1954), pp. 334-343.

要在社会之中推进理性决策的雄心壮志，而这一点构成了民主现代性的真正基础。森强调，布坎南在不同方面的理论贡献都体现出，他在社会思想上的领导力，源于他开创了公共推理的氛围，从而深刻地改变了社会决策的环境，创造了关于公共讨论和社会中人际互动的极其重要的社会思想“品位”。^①

再次，财政学与一般经济理论、经济学与道德哲学构成了布坎南学术思想的发展不断地从特殊到一般的演进式的循环过程。财政学往往成为他思考某一问题的出发点，之后再吧研究范式和结论加以推广，使之超越财税领域，进入普遍的经济领域和社会政治视野。

意大利访学结束回到美国后，布坎南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个人专著《公债的公共准则》。由此引发的论战促使他深入研究机会成本概念，后来写成了《成本与选择》这本小书，其核心主张是把经济分析化简到个人选择的背景之下，这也意味着应以主观效用界定成本。他自认为这是他最好的一本经济理论著作。^②

在与戈登·塔洛克合写后来被称为“宪政经济学”开山之作、公共选择理论的经典《同意的计算》（1962）时，布坎南并未体会到他发现威克塞尔的著作或是洞悉公债理论之堂奥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兴奋。他们认为，自己不过是把比较简单的经济分析应用于讨论不同政治决策规则之间的选择问题，虽然此前无人这么做，但这在本质上不过是写出那些显而易见的道理，而没有开辟全新的研究领域。

在《同意的计算》之后，布坎南的研究工作也没有骤然从标准的财政学转向公共选择经济学。在与塔洛克合作撰写此书的稍早之前，他出版了《财政理论与政治经济学》一书。在回顾1956~1966年这段经历时，布坎南说，他自己的工作主要是在填补公共物品理论的分类研究和把理论福利经济学的熟悉命题分解到个人选择场景中去这两者之间的空白。《俱乐部的经济学理论》一文就是这样的例子。《民主过程中的财政》（1966）则尝试把正统的财政学与政治决策结构理论结合起来。再后来与理查德·瓦格纳合作的《赤字中的民主》（1977）一书，则是运用初级的公共选择理论批评了凯恩斯的政策理论。

最后，在政治哲学上持续不断的关注和长久兴趣，成为布坎南在不同的应用和扩展中所坚持的契约论立场的基本要素，为立宪政治经济学奠定了雄厚基础。

^① Amartya Sen, On James Buchanan,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80 (2011), pp. 367-369.

^② 本文所涉及的布坎南的学术传记材料均参考了这本书：James M. Buchanan, *Economics from the Outside In: "Better than Plowing" and Beyond*,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2007.

在《自由的限度》一书问世以前，布坎南已经出版了《公债的公共准则》、《财政理论与政治经济学》和《民主过程中的财政》等书，其中最重要的是后来被公认为公共选择学派奠基之作的《同意的计算》。究竟是什么契机促使布坎南开始研究有关无政府和利维坦这类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问题呢？在其思想自传《胜过耕田》中，布坎南对此有所阐述。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一直坚信，尽管政治层面失败现象频多，但是在宪制框架的限定下，管治当局最终会对公民的价值和偏好做出响应，并据此施政行事。这种对民主过程最终效能的信念，使布坎南一度为政治制度运作的基本“逻辑”做辩护。《同意的计算》即是在讨论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布坎南后来承认，《同意的计算》和《民主过程中的财政》都隐含着对美国政府的基本管理制度的积极评价，隐含的模型是秩序，这表现出了公共选择的夏洛茨维尔岁月的乐观主义特质。

然而，60年代末的社会混乱局面使他的这一信条发生了动摇。布坎南观察到，制度结构的失败表现在方方面面，既不能有效应对大规模的行为失序，政府支出膨胀又偏离了公众的利益。也就是说，当时的美国在公民社会中出现了无政府状态，政府层面又呈现出利维坦的倾向。

在上述背景下，布坎南意识到深入研究基本政治哲学问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发觉仔细探究无政府和利维坦的运作特征很有帮助。在现实社会失序的背景下，布莱克斯堡时代要研究的模型已不再是秩序，而是无政府；所研究的问题不是要弄清业已存在的稳定秩序的含义，而是要解释并弄懂如何从无政府状态中产生出秩序来。顺便说一下，《自由的限度》一书英文版的封面设计即形象地体现了无序与有序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一阶段，托马斯·霍布斯成为布坎南要研究的位于舞台中央的政治哲学家了。

此时，他的南方人同事、极具天分的温斯顿·布什，以现代经济理论分析了霍布斯式丛林世界的无政府状态，为布坎南的《自由的限度》一书提供了扎实的起点。然而，布什在布莱克斯堡仅仅两年的短暂岁月，连同公共选择研究项目在探讨无政府时激燃起的热情之火，随着1973年他在一场意外中的悲剧性死亡而宣告终结。那一年，布什年仅33岁。两年后，布坎南把《自由的限度》这本书题献给这位英年早逝的同事。多年以后，布坎南回忆这段往事时，仍惋惜地表示，他很难想象，若假以天年，温斯顿·布什会做出多么了不起的贡献。他称布什为弗吉尼亚政治经济学派发展史上最耀眼的一颗流星。

关于《自由的限度》一书的主题，斯科特·戈登（Scott Gordon）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评论指出：“《自由的限度》主要涉及两个论题。其中，一个论题是尝试构造了一种新的关于国家的契约理论，而另一个则是论述了国家的合法限度。后者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而且，从政治哲学

的观点来看，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①劳伦斯·S. Moss)在《法律与自由》中评论道：“有一群颇具影响力的学者，学分析成功地应用于研究政治过程，使人们对政治经济学的重大问题上兴趣，詹姆斯·M. 布坎南教授就是其中的一员。在《自由的限度》这部他的最新著作，也是极其雄心勃勃的著作中，布坎南为法的起源提供了一种经济学解释，并且，同时阐明了美国现在的法律和立法体系中的种种缺陷。他提供了一种精致而又令人振奋的分析。”^②

布坎南本人曾提及，一些建设性的评论者认为，《自由的限度》是对罗尔斯的《正义论》(1971)和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1974)所做工作的补充。这三部著作标志着政治哲学的新生。布坎南认为，他在政治哲学方面的持续不断的关注和兴趣，融会成为他在不同的应用和扩展中所坚持的契约论立场的基础要素。这个兴趣连同早年威克塞尔对他的影响，为“宪政经济学”或“立宪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雄厚的根基。

在《自由的限度》之后，布坎南和布伦南合作出版了《征税权》和《规则的理由》(中译本合并了这两本书，名为《宪政经济学》)。布坎南自陈，《自由的限度》虽然提出了利维坦式国家的威胁，但没有进行形式化的分析。新的合作者同他一道探讨了政府最大化税收的影响，意在以最坏的利维坦模型，得出应对征税权进行立宪层次上之限制的结论。《规则的理由》则回应了外界对《征税权》的误解和批评，并超出了财政范畴，探究一般性的宪政政治经济学问题。立宪分析的主题是布坎南自从受到威克塞尔的影响起，特别是在《同意的计算》之后，贯穿其所有工作的基本特征。

由此我们可以约略判断《自由的限度》一书在布坎南学术生涯中的重要意义。此书中文译稿完成后，布坎南学术思想研究专家马珺博士审读了我的译稿，并专门撰写了题目为《自由人的自由契约》的长篇书评。在这篇视野广阔、内容扎实的论文中，下面这段评价，有助于读者了解《自由的限度》一书在布坎南学术思想发展脉络中的特殊意义。“假如允许为布坎南的学术生涯找到一条线索，相信很多人都会承认，他一生都在做一件事，即把经济学作为广义道德哲学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重新加以阐述。贯穿其理论思路的两条线索，一条是实证的，表现为官僚、选举和投票理论，另一条是规范的，表现为规则、立宪的研究。布坎南早期的工作主要集中于前一方面。本书是布坎南研究思路的一个重大转折，此后，他的主要精力集中于系统阐述后一思路，但

① 摘译自 James M. Buchanan, *The Limits of Liberty: Between Anarchy and Leviatha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封底评论。

② 摘译自 James M. Buchanan, *The Limits of Liberty: Between Anarchy and Leviatha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封底评论。

他在这方面的主要工作也在其 1986 年荣膺诺贝尔奖之前均已完成……本书探讨的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困境……”^①

为把握布坎南的方法论立场，作为对照，可以参与以下资料。布坎南本人在回复汪丁丁的书面专访时说：“我从来没有太担心过如何澄清我自己或我（在经济科学与道德哲学之间）的位置。我感觉到这种作为科学家的经济学家与作为道德哲学家之间的紧张，但我们必须坚定地把握住经济学学科核心的科学性，同时试图将它的意义扩展开来，去认识一个有序社会的潜力。”^②布坎南坚持了经济学的科学性，但他没有满足于做一个不问社会秩序与政治哲学的实证主义经济学工匠。

三、书与人：命运的归途

书和人一样有自己的命运。书好人好，命途也未必平顺。完成这部译稿耗费了我很长时间。在那些年，原版书同我一道流寓不定。它曾随我一起到了冀东南地区，经受过那里平原烈日的暴晒。它也曾跟我到了欧洲，目睹过狂欢节一日八场雪的奇景。如果从付出的角度衡量工作的意义和价值，那么，在我所有的译著中，我最看重这件翻译成果。

《自由的限度》一书译稿于 2001 年初完成之际，就交给了出版社。从那时起，我一直期待着此书出版的消息，以便及时履行给原作者寄去中文版样书的诺言。一天天，一年年，失望复盼望……中间反馈过来的消息，有时是说此书已被列入十分著名的一套汉译名著丛书；有时又是坏消息，似乎是这本书受到了一些阻力，上级审查过后虽无负面的结论，但估计是出版者心里没了底。就这样一拖再拖，但我内心始终抱着单纯的乐观。

交稿 10 年之后，事情似乎又有转机。2010 年 9 月末的一个夜晚，忽然收到了出版社发来的邮件，通知我《自由的限度》一书中译本校样已经出来，要求我在译稿付印之前再看一遍校样。得知此事令我感慨万端，溢满胸中的复杂感受，一时几乎无法用言语形容。现在补记此事，那些感受重新回到我心。

经过近十年的漫长等待，如今等来了我的译稿将要付印的好消息——仿佛我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有了音讯。我要洒扫庭除，备下崭新的衣服和铺盖，整理好书桌上凌乱的书刊资料，迎接这个孩子在长久失散之后的第一次还家。

^① 马珺：《自由人的自由契约——评 J. 布坎南〈自由的限度——在无政府和利维坦之间〉》，《财资经济》2004 年第 2 期。

^② 参见“汪丁丁专访布坎南”（见 1998 年 6 月 10 日布坎南教授给汪丁丁的复信），载高小勇、汪丁丁编：《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大师论衡中国经济与经济学》，朝华出版社 2005 年版。

过了这么多年，时光溜掉了，我还在这里耐心地等你。虽然在方城里兜兜转转，从不见阳光的蟑螂居西迁再北移，但我心中始终有一个位置留给你。岁月增添了我的白发，你却还是那样健壮聪慧，未蒙纤尘。这一次，我要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让你和你的兄弟姐妹们欢聚。我深知，这注定又是一次短暂的重逢。因为，书和人一样，有其自己的命运。书，虽是作者所写，译者所译，但它最终不属于作者和译者，不囿于书架和案头，而是理应拥有更广阔的天地。

接下来完成了二校的程序，我认真地再次校订了译稿。校稿工作虽稍有拖延，但交出校样后，心情无比轻松。我随手记下：时节轮转，冬去春来；南阳台上的朱顶红和蝴蝶兰开得正盛。

孰料事情再起波澜。因出版方内部版权管理不力，此书的出版之事最后终于偃旗息鼓。如今，希望一而再、再而三地落空，我的译稿清样依然躺在出版社的卷柜里，无声无息。不知道今后这个译本是否还有得见天日的机会。恐惧自由的人们，渐渐地会丧失对良好社会秩序的形象能力。这是我到今天唯一的感慨。

我并非特别在意自己的努力似乎已付诸东流，而是对最终没能履行为布坎南教授寄上《自由的限度》简体中文版样书这个承诺，怀有极大的遗憾和深深的歉意。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常常因为思想上的懒惰，对基本价值的怀疑，以及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怯懦和恐惧，而不自觉地悄然停顿甚至中止了追求知识和真理的脚步。在客观上，这使我们许多有价值的工作，未竟全功即半途而废。由衷地希望布坎南教授生前即能够深刻体察中国学者的特殊处境，也祈求他的在天之灵给予宽宥和谅解。

让人稍感安慰的是，《自由的限度》这本书的中文简体字版于2013年初终于面世了，这个版本是由新一代“90后”的年轻译者翻译的。算起来，这本书的中译者，前有在台湾出版了繁体字版的“50后”的顾肃先生，后有小将董子云同学，我这位“70后”的译者竟是运气最差的一个。不过，不论是谁的译本，只要能够顺利出版，对于布坎南学术思想在中文世界的传播来说，都是功德无量的好事。毕竟，学术乃天下公器，成功不必在我。

当然，作为布坎南著作的中文译者之一，我也有个小小的心愿，那就是希望有朝一日，我的译本也能出版。届时我们可以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更加多样化的选择，有心人或许还可以比较评鉴《自由的限度》这本书不同中译本各自的特色与得失，通过文本细读的比较方法，研究政治哲学和经济学等不同专业背景，对三位译者理解和翻译布坎南的这部跨学科著作的影响。这样的工作对于我们准确把握布坎南的学术思想，深化理论研究，无疑是有好处的。

四、回响：穿越时空的讯息

在2000年末我的译稿即将完成之际，我曾写信给乔治·梅森大学公共选择研究中心，打算向布坎南教授请教《自由的限度》一书的若干问题，并邀请他为中译本赐序。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发现了原版书在排印和用词上的一些错误，经与原作者核实，这些地方均在我的中译本中改正过来。他的秘书乔·安·伯吉斯（Jo Ann Burgess）女士热情解答了译者就书中内容提出的疑问。

布坎南教授应译者之邀为我这部中译本撰写了简短的序言。在序言中，他谈到这本书的写作缘起，即回应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乱局；他以“自然均衡”概念为起点，构造了政治秩序在理论上的契约基础；谈到了各种社会有效制约政治机构的难题；还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强调了这本书中所包含的思想具有普适性。

国内一些朋友对布坎南学术思想的普遍意义存有误解。1998年6月，在与布坎南教授通信及采访他时，汪丁丁先生曾问及：“……你预期或希望你的哪些思想将会在中国未来的，也许要等20或30年时间，公共选择过程中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布坎南的回答是：“我始终有些担心我的那些东西，尽管在某些方面相当普适，也许就其在美国环境中的应用而言大多是非常本地化的，这使得我的著作在美国社会限度以外基本上无足轻重。”^①一些读者根据布坎南教授对汪丁丁有关其理论适用性问题的类似回应判定，布坎南教授认为其理论不适用于中国。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极严重的误读和误解。^②

在下面这篇短序里，时年已81岁高龄的布坎南教授，向他的生活在中文世界里的读者们，发出了一条十分明确的讯息。^③只是由于我的译本至今尚未出版，这个信息直到13年后的今天，在他辞世一年半后，才有机会首次公布给大家。最后，希望他的学术思想和谆谆教诲能够激励我们，让我们满怀信

① 参见“汪丁丁专访布坎南”（见1998年6月9日汪丁丁致布坎南教授的信和1998年6月10日布坎南教授给汪丁丁的复信），载高小勇、汪丁丁编：《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大师论衡中国经济与经济学》，朝华出版社2005年版。

② 除了对布坎南思想的普遍价值趋于否定的误解之外，国内外思想界常常因为布坎南积极倡导发挥市场的作用，反对政府演变成利维坦式的庞然怪物，而给他贴上保守主义者的标签。布坎南本人对此做出了澄清。他强调自己坚持的是构成了西方国家秩序制度建构与演化之基础的古典自由主义理念，但在社会秩序方面保有建构论的思想。这一点与哈耶克晚年的秩序观念或保守主义的看法有所不同。参见：James M. Buchanan, “Why I, too, am not a conservative,” in his *Why I, Too, Am Not a Conservative: The Normative Vision of Classical Liberalism*, Cheltenham, UK · Northampton, MA, USA: Edward Elgar, 2005, pp. 1-10.

③ 笔者根据布坎南教授2001年2月20日写给《自由的限度》中译本的英文序言译成中文。

心，继续努力探索捍卫自由和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

附布坎南教授短序

我祝贺《自由的限度》中译本的问世。本书中所阐述的思想，既不囿于褊狭的视野，也不限于特定的时间。不论何时何地，对于各种社会的组织来说，这些思想都保有普遍的适用性。

在一定程度上，写作这本书是对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混乱局面所作的反应。在这一时期里，许多业已建立起来的种种制度、规则、惯例和行为模式，尤其是曾为高等院校中的工作提供基本准则的那些东西，似乎不起作用了。在许许多多方面，无政府状态似乎构成了威胁。然而，无政府状态会怎样运转，恰恰是对于理解这一点，那时人们似乎还很少或者没有做出努力，进行认真的分析。

我受到我的同事温斯顿·布什的鼓舞，致力于研究从无政府状态进入社会秩序所涉及的基本问题。这本书就是题献给他的。他的“自然均衡”概念提供了一个起始点，这使我得以构造出政治秩序在理论上的契约基础。然而，阐释和理解从无政府状态迈出的这一步比较容易，阐释和理解一旦建立起政治机构之后，怎样才能予以有效限制却比较困难。因此，本书的副标题是“在无政府和利维坦之间”。而在这一点上，我的论证只是进一步确认了任何一个社会都必然面临的种种难题而已。

如果说这本书里确实有一个中心思想的话，那么它必然是这样一条不言而喻的意见，即当每个社会试图在从无政府到利维坦这一系列形态中，找到它的定位时，对社会秩序问题的全面理解，对于找出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来说，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詹姆斯·M. 布坎南

2001 年 2 月 20 日

参考文献

1. James M. Buchanan, *The Limits of Liberty: Between Anarchy and Leviatha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2. James M. Buchanan, "Why I, too, am not a conservative," in his *Why I, Too, Am Not a Conservative: The Normative Vision of Classical Liberalism*, Cheltenham, UK · Northampton, MA, USA: Edward Elgar, 2005, pp. 1 - 10.
3. James M. Buchanan, *Economics from the Outside In: "Better than Plowing" and Beyond*,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2007.
4. Amartya Sen, On James Buchanan,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80 (2011), pp. 367 - 369.